

城市外来人口劳动福利获得歧视分析

王海宁 陈媛媛

【摘要】文章以2008年四大城市的外来人口问卷调查资料为基础,对比分析了本地市民、外来市民和农民工在劳动福利总量及具体福利项目获得上存在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并测算了外来人口所受到的歧视程度。结果表明,三群体在劳动福利获得上存在“梯度”差异;劳动合同和城市因素对各群体的影响均显著,农民工受人力资本和社会禀赋的双重影响,本地市民和外来市民则受雇主类型的影响较大;与本地市民相比,农民工和外来市民在劳动福利获得上均存在歧视,且前者所受歧视程度大于后者。与外来市民相比,农民工在社会保险参与率上存在歧视,但在假期获得上不存在歧视。

【关键词】外来人口 福利歧视 市场多重分割

【作者】王海宁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陈媛媛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博士研究生。

一、研究背景与数据来源

20世纪90年代以来,进入东部沿海城市但不具有流入地户口的外来人口数量逐年递增。但这些外来人口在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获取城市公共资源等方面均处于不利地位,尤其是在劳动福利获得方面普遍遭受歧视(曹信邦,2008;杨桂宏、胡建国,2006)。根据国家统计局2006年对外来人口中农民工的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情况调查显示^①,农民工的福利待遇普遍不高,有双休日的仅占11.87%,可以带薪休假的仅占20.47%,购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的农民工分别占被调查农民工总数的26.63%、26.23%、15.35%和32.54%,这些数字都远低于本地就业人口。

针对外来人口在劳动福利获得上存在的差异,以往的理论 and 多数实证研究表明,除受个体和区域等因素影响外,由制度性和社会性因素导致的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多重分割,如城乡分割、地区分割、“国有一非国有”的部门分割和产业分割等是其主要根源(陈映芳,2005;高文书,2007;王元璋、盛喜真,2008)。外来人口由于不具有流入地户口,与本地市民身份不同,法律地位不同,在劳动福利方面不能享受与本地市民相同的待遇。以往研究主要

^①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fx/fxbg/t20061011_402358407.htm)。

从制度性因素和非制度性因素两方面对外来人口的劳动福利进行了研究,大多局限于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障方面,未涉及其他福利项目;忽略了对劳动福利总量的考察,同时没有对外来人口在劳动福利总量和具体福利项目获得上所受到的歧视程度进行估算。借鉴以往相关研究经验,本文利用2008年对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四大城市外来人口的抽样调查数据,使用计数和Logit回归模型,从劳动福利总量与具体福利项目获得上比较分析本地、外来市民和农民工之间存在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检验外来市民和农民工在劳动福利获得上是否存在歧视及歧视程度。

本研究采用2008年“中国大城市中的农村转移劳动力”课题组在北京、上海、天津和广州四大城市的问卷调查资料。该调查采取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城市社区抽样以4个城市的全部行政区作为样本框,在每个城市抽取2个区,再从抽中的区中抽取2个居委会,每个居委会中抽取100户样本家庭,总抽取1804个家庭样本,获得1797份有效问卷。其中农民工1017人(占57%),外来市民378人(占21%),本地市民397人(占22%)。

二、本地市民、外来市民和农民工的劳动福利获得状况

调查数据显示,本地、外来市民和农民工在劳动福利获得总量上存在较大的差异(见表1)。本地市民中拥有全部福利者最多,占本地市民总量的45.91%,是总体水平的2.17倍。外来市民在频率分布上与总体基本一致,与本地市民相比,外来市民中拥有两项及以下福利者所占的比重均高于本地市民,其中没有任何福利者所占的比重相差最大,是本地市民的5.58倍。而拥有3项及以上福利者均低于本地市民,其中拥有全部福利者所占的比重相差

表1 本地、外来市民和农民工劳动福利获得总量的情况

	总体		本地市民		外来市民		农民工	
	人数(人)	频率(%)	人数(人)	频率(%)	人数(人)	频率(%)	人数(人)	频率(%)
福利总量(项)								
0	523	29.63	17	4.22	78	23.56	397	46.98
1	216	12.24	20	4.96	35	10.57	132	15.62
2	230	13.03	28	6.95	48	14.50	136	16.09
3	130	7.37	33	8.19	25	7.55	50	5.92
4	149	8.44	62	15.38	24	7.25	48	5.68
5	144	8.16	58	14.39	33	9.97	31	3.67
6	373	21.13	185	45.91	88	26.59	51	6.04
样本量	1765		403		331		845	
均值	2.62		4.52		3.01		1.43	
标准差	2.33		1.79		2.36		1.82	
Wilcoxon 检验	A: z=-21.429, Prob> z =0.0000 B: z=-10.578, Prob> z =0.0000 C: z=-8.637, Prob> z =0.0000							

注:(1)“P>x”指基于统计量x的显著性检验中的弃真错误概率。(2)A是农民工与本地市民检验结果;B是农民工与外来市民检验结果;C是外来市民与本地市民检验结果。

最大,仅为本地市民的 3/5。农民工中没有任何福利者最多,拥有两项及以下福利者所占的比重均高于本地市民,并随着福利总量的下降,二者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没有任何福利者所占比重是本地市民的 11.13 倍;而拥有 3 项及以上福利者所占比重均低于本地市民,并随着福利总量的上升,二者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拥有全部福利者所占比重不足本地市民的 1/7。与外来市民相比的情况和与本地市民相比的情况基本一致,只是二者之间的差距有所缩小,没有任何福利者所占比重是外来市民的 1.99 倍,而拥有全部福利者所占比重不足外来市民的 1/4。从人均福利拥有量来看,本地市民和外来市民分别为 4.52 项/人和 3.01 项/人,均高于总体平均水平,而农民工的人均福利拥有量仅为 1.43 项/人,远低于 2.62 项/人的总体平均水平。Wilcoxon 秩和检验进一步表明 3 个群体在劳动福利获得总量上存在较大的差异。

从各群体具体福利项目获得状况来看,三群体之间同样存在差异(见表 2)。本地市民在各项福利获得率或参与率上均高于总体平均水平。其中失业保险参与率最高,为 90.44%,工伤保险参与率最低(69.06%)。外来市民在各项福利获得率或参与率上虽高于总体平均水平,但低于本地市民,其中失业保险参与率不到本地市民的 1/2,而差距最小的公共假期获得率也仅为本地市民的 75.84%。农民工在各项福利获得率或参与率上均低于本地和外来市民,其中与本地市民的差距大于与外来市民的差距。

表 2 本地、外来市民和农民工具体福利项目获得状况

	公共假期	周末	医疗保险	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
总体	53.24	47.18	45.11	44.74	31.12	40.72
本地市民	74.57	70.69	87.01	85.26	90.44	69.06
外来市民	56.56	51.20	50.45	53.43	41.19	46.99
农民工	38.61	32.11	20.19	18.42	9.45	24.00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证明本地、外来市民和农民工在劳动福利获得方面存在“梯度”差异。但劳动福利的获得与个人的自身因素和社会禀赋有着密切的关系,下面将检验这 3 个群体之间在个人因素及社会禀赋上是否存在差异,并通过计量模型进一步的检验在控制这些因素之后,三群体在劳动福利获得上是否仍旧存在差异。

三、人力资本和社会禀赋差异

比较三群体的人力资本和社会禀赋,从表 3 可以看出,3 个群体在性别构成上差异不大,年龄上农民工和外来市民的平均年龄相当,均比本地市民平均年龄小 8 岁左右,受教育程度上外来市民略高于本地市民,但两者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高出农民工 3 年和 2.48 年。本地市民、外来市民和农民工在接受培训、合同签订及劳动法知晓率的比重上依次递减,之间的差距基本相等。在社会禀赋上,本地市民主要在国家机关、国企和垄断行业从事管理和技术工作;农民工主要就职于私营企业或为个体工商业者和自我雇佣,主要从事商业和服务

表3 本地、外来市民和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禀赋描述性统计

	本地市民		外来市民		农民工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性别(女)	0.51	0.5006	0.52	0.5002	0.60	0.4894
年龄	40.45	10.9122	31.45	8.8685	33.43	8.9631
受教育年限	12.40	3.1378	12.92	3.4442	9.92	3.0600
培训(未接受)	0.74	0.4401	0.56	0.4966	0.38	0.4856
合同(未签)	0.73	0.4471	0.55	0.4977	0.34	0.4751
行业类型						
制造业	0.12	0.3219	0.10	0.2944	0.21	0.4041
建筑业	0.02	0.1544	0.04	0.1934	0.03	0.1813
交通运输	0.09	0.2869	0.06	0.2428	0.05	0.2189
商业	0.12	0.3248	0.30	0.4609	0.35	0.4759
服务业	0.06	0.2350	0.08	0.2680	0.09	0.2933
垄断行业	0.35	0.4779	0.29	0.4542	0.08	0.2710
雇主类型						
国家机关、国企	0.44	0.4972	0.16	0.3627	0.08	0.2692
集体企业	0.10	0.3036	0.06	0.2316	0.04	0.1843
“三资”企业	0.06	0.2350	0.10	0.2944	0.08	0.2764
私营企业	0.17	0.3746	0.32	0.4681	0.28	0.4516
个体工商户	0.04	0.2051	0.15	0.3598	0.25	0.4351
自我雇佣	0.09	0.2903	0.16	0.3710	0.22	0.4116

注:括号内为参照组。

业;外来市民则居于两者之间,主要就职于私企,但就职于国家机关、国企的比重明显高于农民工,行业上主要从事商业和垄断业,职业主要为管理技术人员和设备操作人员。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的基本判断是:个人自身因素和社会禀赋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释本地、外来市民和农民工之间在劳动福利获得上存在的差异。然而,控制了上述因素后,外来人口在劳动福利获得上是否与本地市民仍存在差异,则需要通过计量模型进行判断。

四、劳动福利获得的歧视分析

因劳动福利总量为计数数据,对此类数据通常采用泊松分布和负二项分布进行拟合,但从劳动福利获得总量的描述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总体和各群体的福利获得总量的均值和方差均不相等(见表1),违背了泊松分布均值应等于方差的假设,因此本文采用负二项分布进行拟合。同时在对具体福利项目获得上采用Logit模型进行拟合。

负二项分布实际上是泊松分布中事件发生强度 λ 服从 Γ 分布而得到复合分布,与泊松分布模型相似,其也是对事件发生强度 λ 进行回归。表达式为: $\ln(\lambda_i) = \beta_0 + \sum \beta_k X_k + \mu$ 。其中, λ 为事件发生强度, X_k 为影响因素,包括自身因素、社会禀赋及歧视因素等。

Logit模型的表达式为: $\ln\left(\frac{p}{1-p}\right) = \beta_0 + \sum \beta_k X_k + \mu$ 。其中, p 为具体福利项目获得的概率, X_k 的含义同上。

(一) 劳动福利总量获得的歧视分析

本文分别对样本总体和分群体的福利获得总量进行了拟合,为了考察外来人口是否在福利获得总量上存在歧视,在总体回归中对就业人口身份变量的参照组设定有所不同,其中

模型一中的参照组为农民工,模型二中的参照组为本地市民。表4给出了负二项回归模型的最大似然估计结果,证实了在劳动福利总量获得上,农民工和外来市民与本地市民相比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歧视。从模型一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控制了人力资本、社会禀赋及城市等影响因素后,外来市民和本地市民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且前者小于后者,表明与本地

表4 劳动福利总量获得的影响因素

	总体		本地市民	外来市民	农民工
	模型一	模型二			
性别(女)	-0.0779**	-0.0772**	-0.1322***	0.0559	-0.0732
年龄	-0.0007	-0.0006	0.0018	0.0019	-0.0024
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					
大专及以上	0.3119***	0.3077***	0.2197	0.1493	0.495***
高中	0.2835***	0.2768***	0.2298	-0.0756	0.5107***
初中	0.0947	0.088	0.1542	-0.4428*	0.2499**
培训(未接受)	0.2290***	0.2326***	0.0517	0.0836	0.4574***
合同(未签)	0.6139***	0.6137***	0.2710***	0.5491***	0.8061***
行业类型(制造业)					
建筑业	-0.1381	-0.1306	0.2074	-0.2048	-0.4368**
交通业	-0.1892***	-0.1796**	-0.084	-0.251	-0.2588*
商业	-0.2825***	-0.2765***	0.0323	-0.4267***	-0.3946***
服务业	-0.3242***	-0.3159***	-0.1263	-0.0828	-0.6449***
垄断行业	-0.1307**	-0.1218**	0.0491	-0.2619**	-0.1373
其他	-0.2227***	-0.2132***	-0.0329	-0.2303*	-0.5512***
雇主类型(私营企业)					
国家机关、国企	0.1607***	0.1633***	0.1481**	0.1244	0.3664***
集体企业	-0.0114	-0.0043	0.0545	-0.0684	-0.0812
“三资”企业	0.1594***	0.1674***	0.1122	0.0567	0.1792*
个体工商户	-0.443***	-0.4362***	-0.1088	-0.6501***	-0.3149***
自我雇佣	-0.4546***	-0.4512***	-0.3917***	-0.6307***	-0.2429*
其他	0.0017	0.0086	-0.0122	-0.1127	0.2195
城市(天津)					
北京	0.1902***	0.1898***	0.0714	0.3868***	0.1915*
上海	0.3489***	0.3395***	0.2480***	0.332**	0.5476***
广州	0.2245***	0.2255***	0.0266**	0.4228***	0.3696***
就业人口身份					
外来市民	0.3343***	-0.1969***			
本地市民或农民工	0.5359***	-0.5281***			
截距	0.027	0.5485***	0.9078***	0.5982**	-0.4364**
样本量	1721		395	324	817
Log likelihood	-2923.5888	-2925.4591	-757.6729	-583.7807	-1116.2318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参照组。

表5 具体福利项目获得影响因素

	公共假期	周末	医疗保险	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
性别(女)	-0.6684***	-0.6004***	0.1415	-0.1099	-0.2712*	0.1723
年龄	-0.0151**	-0.0087	0.0039	0.0243***	0.0018	-0.0060
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						
大专及以上	0.9109***	1.0264***	0.8424***	0.8955***	0.6900**	0.6360**
高中	0.9903***	0.8724***	0.1802	0.4228*	0.4406	0.5369**
初中	0.4465**	0.3627*	-0.1375	-0.0034	-0.1641	0.1615
培训(未接受)	0.6631***	0.6704***	0.5521***	0.5568***	0.4266***	0.6837***
合同(未签)	0.8669***	0.8172***	1.5621***	1.6535***	1.7290***	1.7863***
行业类型(制造业)						
建筑业	-0.8522**	-1.0688***	0.2385	-0.2294	0.0502	-0.0525
交通业	-1.5195***	-0.7187**	0.3375	-0.1541	0.4440	-0.1198
商业	-1.6322***	-1.0911***	0.1004	-0.0907	0.0288	-0.4608*
服务业	-1.3034***	-1.1503***	-0.1968	-0.3263	0.1384	-0.4653
垄断行业	-0.7106***	-0.6407***	0.2827	0.2804	0.3291	-0.4521*
其他	-1.1773***	-0.8239***	0.0451	-0.0562	-0.1461	-0.8123***
雇主类型(私营企业)						
国家机关、国企	0.0883	0.5491***	1.2984***	1.1546***	0.9759***	0.9588***
集体企业	-0.7767***	-0.3091	0.3979	0.0296	-0.3498	0.6751**
“三资”企业	0.1652	0.2901	0.5831**	0.8767***	0.7294***	1.1006***
个体工商户	-0.7937***	-0.7568***	-0.2577	-0.3255	-0.5880**	-0.4228*
自我雇佣	-0.8278***	-0.8061***	0.2500	0.3794	-0.3152	-0.7881***
其他	-0.3175	-0.3096	0.3487	0.5225	0.0089	0.4069
城市(天津)						
北京	0.5840***	0.5071**	0.1144	0.8269***	0.8209***	-0.4026*
上海	1.3712***	1.4345***	0.6381***	1.7229***	0.8435***	-0.0435
广州	0.3941**	0.4148**	0.4979*	1.3899***	0.3638	-0.6150***
就业人口身份						
外来市民	-0.5614***	-0.5064***	-1.5774***	-1.1149***	-0.7982***	-0.3777*
农民工	-0.8900***	-0.8145***	-2.3027***	-2.0530***	-2.0177***	-0.9694***
截距	0.9851**	-0.0519	-0.8726*	-2.4431***	-2.0626***	-1.0044**
样本量	1730	1727	1729	1729	1722	1730
Log likelihood	-825.1837	-842.2432	-704.3845	-677.4142	-629.0918	-734.7291

注:由于篇幅所限,没有给出就业人口身份因素中外来市民与农民工的对比结果和分群体的具体福利项目的回归结果。***、**、* 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参照组。

表6 农民工和外来市民估计的具体福利项目参与率

	公共假期	周末	医疗保险	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
农民工—本地市民	60.80	49.47	68.60	64.82	31.88	41.37
农民工—外来市民	34.12	20.43	22.55	30.58	15.94	35.82
外来市民—本地市民	69.46	65.27	76.72	77.31	54.63	57.23

市民和外来市民相比,农民工在劳动福利总量获得上均受到歧视。同时,也证实了与本地市民相比,农民工受到了城乡和区域双重歧视,而外来市民仅受到区域歧视,因此农民工受到的歧视程度要大于外来市民。从模型二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外来市民和农民工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且前者大于后者,表明与本地市民相比,外来市民同农民工一样,在劳动福利总量获得上也受到歧视,但受歧视程度小于农民工。

F 检验表明 3 个群体在劳动福利总量获得影响因素上存在较大的差异,总的来看,劳动合同的签订和城市因素对 3 个群体的影响都具有显著性。劳动合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就业正规化程度的变量,劳动合同的签订可以有效地保障各群体的合法权益。城市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会提高全体劳动者的福利待遇,而各城市对待流动人口的态度和政策上的差异会对外来人口福利状况产生影响。北京、上海和广州作为全国流动人口的主要聚集地,近年来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提高外来人口就业和社会保障的政策措施,使外来人口的劳动福利状况有了较大改善。本地市民主要受雇主类型因素的影响,农民工主要受教育程度、是否接受培训、行业类型及雇主类型的影响,而外来市民主要受行业和雇主类型的影响。利用本地市民和外来市民的福利总量获得方程,分别估计农民工在受到与本地市民和外来市民同等待遇时,以及外来市民在受到本地市民同等待遇时所获得的福利总量,以检验外来人口在福利总量获得上存在歧视的程度。通过计算得出,农民工若受到与本地市民同等待遇,其人均福利将大幅提高,为 3.35 项/人,是原来人均福利的 1.34 倍,若受到与外来市民同等待遇,其人均福利为 1.81 项/人,提高的幅度较小,与实际人均福利相比仅提高了 27%。外来市民若受到与本地市民同等待遇的话,其人均福利为 3.93 项/人,与实际相比上升了 31%。上述结果表明,无论是与本地市民还是与外来市民相比,农民工在劳动福利总量获得上均存在歧视,且前者对农民工的歧视程度远远大于后者。外来市民与本地市民相比也存在歧视,但与农民工相比所受的歧视程度相对较小。

(二) 具体福利项目获得的歧视分析

表 5 给出了具体福利项目获得率或参与率的 Logit 回归结果,在控制了人力资本、社会禀赋和城市等因素后,与本地市民相比,农民工在各项福利获得上均存在歧视,其中在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的获得上所受到的歧视程度较大。当农民工获得与本地市民同等待遇时,“三险”的参与率将分别为 68.60%、64.82%和 31.88%(见表 6),与农民工的实际参与率相比提高了 2.40、2.52 和 2.37 倍。与外来市民相比,农民工在公共假期和周末假期的获得上不存在歧视,当获得与外来市民同等待遇时,反而下降了 11.63%和 36.38%。而在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上存在歧视,其中在养老保险和工伤保险获得方面所受的歧视程度较大,在与外来市民享受同等待遇情况下,二者将分别上升 66.01%和 49.25%。与本地市民相比,外来市民在各项福利获得上也均存在歧视,其中在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获得上所受到的歧视程度较大,在与本地市民享受同等待遇情况下,外来市民的医保和养老保险参与率将会分别提高 1.52 和 1.45 倍。

综上所述,与本地市民和外来市民相比,农民工在各项保险的获得上均存在歧视,且与

本地市民相比所受的歧视程度更大。而在假期等福利待遇上,农民工与本地市民相比存在歧视,而与外来市民相比则不存在歧视,若在同外来市民享有同等待遇条件下,其福利获得率反而会有小幅下降。外来市民与本地市民相比,在各项福利获得上也均存在歧视,但受到的歧视程度明显小于农民工。

此外,从分群体各项福利获得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各群体在具体福利获得上所受的影响因素存在较大的差异。合同的签订可以有效地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因此各群体具体福利项目的获得上均具有显著影响。在假期获得方面,本地市民主要受性别和行业因素的影响;农民工除了年龄因素外,其他各因素都对其有所影响,而外来市民主要受雇主类型的影响。在各种保险的参与率上,3个群体均受到雇主类型和城市因素的影响,并且具体保险对参与者自身的个别因素存在选择性,如年龄因素对养老保险的参与率具有显著的影响。此外,农民工主要受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和是否接受过培训的影响,外来市民主要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在工伤保险参与率上还受行业因素的影响。

五、结 语

本研究结果显示:(1)本地市民、外来市民和农民工在劳动福利获得方面存在“梯度”差异。(2)三群体在劳动福利获得的影响因素方面存在较大差异。(3)外来人口在劳动福利获得上所受歧视程度不同。可见提高外来人口劳动福利水平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完善流入地城市针对外来人口的劳动福利获得所制定的相关政策,在政策制定中不应只局限于农民工,也应考虑外来市民。其次,要加大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和保障制度的改革力度,构建城乡和区域一体、高效公平、开放的劳动力市场,将就业和福利与户口“脱钩”,提高外来人口在劳动福利获得上的地位,消除制度歧视。再次,规范企业用工行为,加大对企业的监督力度,推动其与雇用的外来劳动力签订劳动合同。此外,由于三群体在劳动福利获得的影响因素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此,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有针对性地提高外来人口的福利水平,尤其是要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平。本研究还表明,虽然企业特征对个别群体在劳动福利总量和具体福利项目获得上影响并不十分显著,即在国有企业和垄断企业中,外来人口在劳动福利获得上也不一定比其他私营企业和竞争企业高,但这些企业也应成为监督与管理的重点。

参考文献:

1. 曹信邦(2008):《就业歧视对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构建的消极影响》,《人口与经济》,第1期。
2. 杨桂宏、胡建国(2006):《农民工城市生活社会保障的实证研究——以北京市X区423名农民工为例》,《调研世界》,第8期。
3. 陈映芳(2005):《“农民工”: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社会学研究》,第3期。
4. 高文书(2007):《进城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影响因素研究》,《市场与人口分析》,第5期。
5. 王元璋、盛喜真(2004):《农民工待遇市民化探析》,《人口与经济》,第2期。

(责任编辑:朱萍)